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3.006

街角诱惑:场域理论视野下校园 “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

孟维杰¹, 范琳琳²

1.鲁东大学 教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2.山东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校园“新街角青年”是处于普通学生向“街角青年”转化阶段的一个边缘弱势群体,其反社会意识相对薄弱,若不及时对其不良行为加以矫正,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阻碍其自身发展,也会反作用于校园文化氛围,严重者会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目前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场域存在街角崇拜下的横向场域流动、学业不良下的资本失衡、学校规训下的对抗性惯习等问题。可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赋能文化资本、破除不良惯习等方面为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出路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街角青年;场域;惯习;资本

中图分类号:G4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3-0041-06

“新街角青年”是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化程度不足而产生的一个边缘弱势群体^[1]。“新街角青年”主要由学生和职业青年组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受到家人的教育、保护和监督,虽并未完全脱离主流社会,但所受的社会化教育程度不足,因此,相对于主流青少年而言是边缘青少年,相对于强势青年群体而言是弱势青少年。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街角青年”中的在校生,即校园“新街角青年”。校园“新街角青年”是由于社会联结薄弱,受“街角文化”影响而向“街角青年”寻求庇护的在校学生。校园“新街角青年”目前还是在在校生,其反社会意识相对薄弱,若不及时对其不良行为加以矫正,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阻碍其自身发展,也会反作用于校园文化氛围,严重者会走向违法犯罪道路。

以往研究提到,很多问题学生在“街角文化”的影响下,成为“街角青年”的“后备军”^[2],但未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郭娟在社会互动理论的视角下,明确提及了“街头少年”与在校学生的互动,也就是本研究中的校园“新街角青年”^[3]。符平则首次提出“新街角青年”的概念,并且较为系统地从亚文化、差异交往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以及心理压力等角度对“新街角青年”的形成原因进行概括^[4]。综上,以往研究并没有将校园“新街角青年”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进行讨论,往往将其与“街角青年”混为一谈,缺乏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生存状态的系统的针对性研究。因此,本研究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将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社会层面相结合,以理解“新街角青年”生存状态,并系统分析校园“新街角青年”所处场域中的资本与惯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干预措施。

一、场域理论与校园“新街角青年”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重要理论成果,该理论包含场域、资本以及惯习三个理论要素。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结构^{[5]133}。布迪厄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来确定场域的界限,由此提出“资本”这一概念,资本是场域内的行动者为获取利润,在资源的排他性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积累的劳动而占据的社会资源。资本是场域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个体所拥有资本的质和量是不同的,资本的类型决定场域的特性。惯习是场域

收稿日期:2025-03-14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新媒体背景下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及干预机制构建研究”(ZZ2019032);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道德脱离理论视域下中学校园暴力及横向干预研究”(18CYJ03)

作者简介:孟维杰(1973—),男,黑龙江龙江人,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琳琳(1993—),女,山东烟台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是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场域主体的知觉、思想和行动形成的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用一个比喻阐述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关系,他将场域比作游戏,将资本和惯习比作游戏中的王牌,王牌为游戏中的行动主体规定了本质属性,并决定了游戏的结果。概言之,场域中行动主体的资本的数量及分布结构确定了场域的边界,场域构造了惯习,行动主体在场域中的活动受惯习指引,并且不断地再生惯习本身,反作用于场域。

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首先,场域理论注重对关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坚持关系主义。这就要求我们从关注校园“新街角青年”本身转向关注其所生存的场域,从对静态实体的关注转向对动态关系的聚焦。其次,传统社会学中,结构与个体,客观与主观都是对立的两极,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对这种二元对立论的超越。场域是客观的,但同时包含主观的成分;惯习是个体的,同时又有客观的渗透,主观和客观共同存在于场域和惯习之中,结构与个体相统一^[6]。“惯习”概念作为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基石,解决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不连续性问题。以往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研究多是将客观环境因素与主观个人因素割裂而来进行阐述,或是将宏观的社会因素与微观的个体因素进行堆砌,缺乏中观层面的系统动态分析。在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可用场域、资本以及惯习三大理论要素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通过场域与惯习间的密切关系,减少结构与个体、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对立性,走出以往研究的误区,消除主客观二元对立论对研究校园“新街角青年”造成的困扰。一方面,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活动场域进行细致分析,探究其场域活动中行动主体的位置、资本以及场域作用下构造的惯习;另一方面,根据场域流动原动力的作用机制,协调场域内各因素间的关系和矛盾,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活动场域进行重塑,为解决其困境提供依据和指导。

二、场域形塑下的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逻辑

(一) 横向的场域流动

场域是行动主体的实践同社会因素之间的中介环节^{[5]145},在校园“新街角青年”与社会的互动中,社会因素并非直接作用于其自身,而是通过场域内部的力量形塑校园“新街角青年”。校园“新

街角青年”的场域不能单一地理解为客观意义上的领地,而是指校园“新街角青年”在其中与社会互动所形成的网络或形构,场域的边界是以个体间的互动来定义的,不论是客观的空间还是主观的空间,都应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校园“新街角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意味着校园“新街角青年”这一群体对特定文化与行为的学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这一互动过程在特定的场域展开,其活动场域同时也受作用于校园“新街角青年”这一行动主体的实践。场域理论认为,行动主体可以在不同的场域之间进行流动。校园“新街角青年”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在学校不被认可,甚至受到普通学生的疏远与排斥,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渴望获得尊重,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是对“街角文化”的盲目崇拜,致使其误认为结识“街角青年”等社会人士可以让自己被认可、被关注,凸显自身价值。布迪厄认为所有的社会秩序,都有其信奉的运行准则^{[7]56}。校园“新街角青年”沿用主流社会的目标与运行准则在亚文化的社会中实践,其实践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的维系和获取,但其所进行的实践无法填补其资本的空缺,不仅不能帮助其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反而会导致其逐渐远离主流社会,这样无效的场域流动无疑使校园“新街角青年”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其根源在于资本量的欠缺以及社会化的不足。

(二) 文化资本失衡

个体在场域内的地位为他们提供了资源、利益和机会去参与场域活动。行动主体通过资本的积累来维持和提升自己的地位,所有形式的资本都位于竞争与交换的系统中,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价值。

经济资本的含义类似于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具体可表现为金钱或其他可体现经济能力的实物。校园“新街角青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主要来自家庭,具有很强的家庭经济依附性。然而,当家庭的经济支持不足以支撑其活动开支时,校园“新街角青年”会采取借钱、打零工、敲诈同学收取保护费或倒卖物资等方式满足经济需求,严重者甚至会参与网赌、“洗黑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拜金主义的盛行导致校园“新街角青年”树立了畸形的金钱观念,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在经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面子”,甚至不惜借钱去娱乐场所消费,这种矛盾的

状态既是社会转型下亚文化侵蚀的结果,也是个体社会化不足的弊端与痼疾。校园“新街角青年”经济资本的贫瘠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资本量的不足,也表现在畸形的金钱观念和狂热的拜金主义上。

文化资本作为一种信息化的资本,为行动主体提供认知与行动信息,以及可继承的文化财富与能力,并且它可以借由社会各种机制来合法化自身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指修养,是身体化的语言,具有持久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二是指文化产品,例如书、画等艺术品,可以凸显行动主体的文化品味,也可以转化为经济、象征、和社会资本;三是指具体的制度化形态,主要体现在学历等方面。学校是校园“新街角青年”生活的核心领域,亦是其文化资本的主要获取渠道^[8]。但是校园“新街角青年”受教育资源不均等现实困境影响,往往处于学习不良的状态^[9],这进一步加深学生逃离课堂、融入街角的愿望,致使校园“新街角青年”在文化资本的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资源,是一种稳固的关系网络,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布迪厄认为,与有权威的人交往所带来的荣耀,是象征资本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社会资本的思考需要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校园“新街角青年”家庭关系冷漠、师生关系紧张的现实削弱了其与传统社会联结的亲密度。从同伴关系来看,校园“新街角青年”过早地成为“街角青年”,并以此为荣。这种“非主流”的惯习决定了他们特定群体内世界观的同质性,无法支持其进行更好的场域流动。

象征资本是布迪厄在提出以上三种资本之后的补充,其价值寓于“无形”之中,并非实物资本,是包含着“荣誉体系”的象征关系,主要在领袖阶层的权威方面起作用,象征着权威与声望,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三种资本的基础^[10]。通俗来讲,象征资本指的获得成就之后所得到的声誉与名望是真的象征资本,除此之外还存在假的象征资本。假的象征资本与真的象征资本拥有同样的光环表征,但假的象征资本缺乏承载的实体^[11]。假的象征资本带来的荣誉具有虚假性和误导性的特点,校园“新街角青年”所追求的便是假的象征资本。校园“新街角青年”因自身资本量的匮乏,无法获

得主流社会所承认的象征资本,迫切地想得到社会的认可。由于接受过社会化教育,所以仍沿用主流社会的标准,渴望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因为社会化教育程度不完全,认知方面存在欠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在校外结识真正意义上的“街角青年”,即他们口中的“大哥”,自认为来自“大哥”的庇护可以使其在校园里高人一等,体验着不同于普通学生的“优越感”,将普通学生对他们的恐惧与排斥误认为是对他们的尊重与关注。为了维系和“街角青年”的社会联结,校园“新街角青年”模仿主流社会的人情世故,将自身为数不多的经济资本投入其中,用于请客吃饭,将本应用于追求文化资本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了和“街角青年”的娱乐生活中,自以为获得了身份与地位,本质上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校园“新街角青年”对假的象征资本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是“街角”亚文化反作用于校园文化氛围的表现,既不利于学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助长了校园中的不正之风。综上,认知能力的欠缺以及社会化的不完全导致校园“新街角青年”追求的是假的象征资本,同时也妨碍了校园的文化建设。

(三)对抗性惯习

资本量的多寡决定着场域内行动主体的权力形态^[12],在学校这一典型的教育场域中教师在课堂处于绝对的优势位置,而校园“新街角青年”由于文化资本量的匮乏,致使其处于劣势位置。资本的不均等赋予了教师主导权力,掌控着教学课堂^[13],因此,教师处于高位置、高权力中,而校园“新街角青年”则处于低位置、低权力的位置权力关系中。这样的差序状态推动着校园“新街角青年”生存场域的不断演化,教师的主导和权威地位也受到了学生惯习的维护。受升学压力与考核标准的影响,教师的热情被逐渐削弱的同时,内心向往的教学愿景也受到了压制,追求高效能的教学,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综合发展,教学活动中充斥着功利主义,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学校应该是读书育人的场所,却成为了考试的加工厂。这样的发展过程形塑了教师的惯习,无不透露着场域策略的无奈^[14]。

福柯认为,空间的功能源自权力的安排^{[15]67}。教室是国家权力对学生规训的主要空间,讲台则是教室中资源分配的中心,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差异的情况下,教室前排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远多于后排学生,后排学生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则处于劣势地位,教室后排空间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符号意义^[16]。教师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课堂秩序,往往将校园“新街角青年”安排在教室后排。处于教室后排的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行为一方面受到权力的空间制约,另一方面也在试图突破权力的禁锢,在学习方面无法得到认可,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凸显自身的价值。因此,校园“新街角青年”在其活动场域内进行自我表现时,其实是对所处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回应。然而,由于社会化程度的不足,校园“新街角青年”往往误用了嬉笑打闹等扰乱课堂秩序的方法来增强存在感,不仅无法获得认同,反而加深了教室后排空间的符号意义。

惯习是主观性的社会化^[17],本身具有一定的束缚性和持久性,场域中行动主体往往在惯习的限制下形成一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校园“新街角青年”是在惯习与场域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建构出来的,惯习又是校园“新街角青年”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校园“新街角青年”认同了自己在场域中所占据的资本量以及权力位置,并在场域活动中不断地进行巩固和加强。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学习成绩长期不理想,面对老师和家长指责,逐渐在学习方面丧失热情与兴趣,情绪和行为方面都出现了厌学表现。“惯习性洗脱”则清晰地阐明了惯习是如何一步步影响校园“新街角青年”的^[18]³⁴。“惯习性洗脱”是指当班级中出现破坏性事件时,老师和同学会习惯性地认为是班级里的“问题学生”做的,长此以往,即使没有老师和同学的怀疑,“问题学生”也会本能地否认。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校园“新街角青年”群体中,他们认同了自己在场域中的资源与位置,教室后排空间作为无人管束的空间,形成了他们缺乏自律性的惯习,并不断地巩固和强化惯习。不仅是在学校中,在社会中也是如此。校园“新街角青年”与其社会关系网之间的互动模式已经成为自然,行动过程中并不需要理性的思考,惯习形塑了行为的默契。校园“新街角青年”因资本量的匮乏导致主体权力的丧失,不良惯习的形成既是场域作用的结果,也是他们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反抗与回应。

三、重塑场域: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出路

(一)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消解街角崇拜

重塑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场域迫在眉睫,本研究在场域理论的视角下为校园“新街角青年”

的矫正提出思路,详见图1。场域的关键思维在于关系的构建。校园“新街角青年”作为在校生,师生关系的和谐程度直接决定其在校学习状态。学校教学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师生间教与学的过程,作为教学过程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所拥有的资本量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造成他们的场域位置也不同。教师在场域中处于优越地位,学生处于服从状态,极易导致师生关系存在的隐性问题。首先,教师应摒弃唯分数论的教育思想,不能以成绩作为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因材施教,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19]⁵²⁻⁵³。更要注重学生的德育发展,帮助校园“新街角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增强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充实其精神世界。其次,应注意加强教师与校园“新街角青年”之间的沟通,缺乏沟通往往造成误会,教师应站在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角度上,充分理解其心理需求,分析其成因,拟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后,教师要注重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情感关怀。情感上的关怀可以拉近教师与校园“新街角青年”之间的心理距离,可以为校园“新街角青年”寻求到情感上的依托,不至于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面对校园“新街角青年”时,不应采用一味的教化方式,应意识到行动主体之间的平等性,重建理解与信任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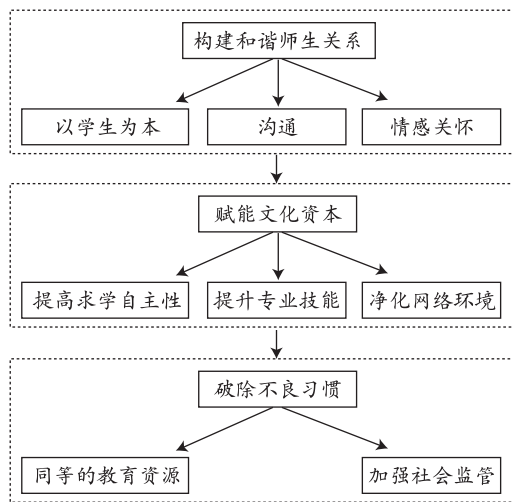


图1 重塑校园“新街角青年”场域模型图

(二) 赋能文化资本,改善学业不良

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行为矫正,无疑要对其回归主流社会进行研究。向主流社会回归的过程,本质上是向上的场域流动。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资本缺乏,可以通过提升资本转换场域。

匮乏的资本并没有给校园“新街角青年”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受教育程度决定个体社会地位的高低,这一论断始终成立。当个体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无法得到提升时,文化资本的提升便是个体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同时,文化资本的提升也可为其他资本的提升创造条件。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经济资本主要来自家庭,提升空间较小,社会资本同质性较高,因此,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回归主要依靠文化资本的获取,文化资本的获取主要依靠教育。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在校生身份,使其在教育场域中处于受教者的位置。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应该是被动施加,应注意提高其求学的自主性。对文化资本的获取不仅仅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获取,也包括专业技能的提升。对于校园“新街角青年”而言,虽然在文化课上存在不足,但也应注重对其专业知识的培养,习得一技之长,为回归主流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当代校园“新街角青年”沉迷于“快手”“抖音”等网络自媒体软件,不免会受到拜金主义、“黑道崇拜”等各种亚文化的影响,国家应净化网络环境,抵制低俗、色情等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同时在网上通过各种丰富的形式宣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向校园“新街角青年”群体传播优秀的主流文化。

(三)破除不良惯习,引导正向成长

惯习虽然是稳定持久的,但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行动主体经验的丰富而不断更迭,破除不良惯习的关键途径之一是改变场域。校园“新街角青年”长期处于教室后排座位,无人管束,形成了缺乏自律性、任性妄为的惯习,因此,学校管理方面应注意,对学生座位的安排方面应注意进行定期的轮换,不以学习成绩排座位,使校园“新街角青年”也能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以及老师的监督管理。其次,校园“新街角青年”闲暇时间大多聚集于网吧、游戏厅等地方。娱乐场所虽然有管理者负责监管维护,但很多经营者往往贪图经济利益或者担心被打击报复,对聚集的校园“新街角青年”并不能起到监管控制作用^[20],纵容了校园“新街角青年”在行为上更加肆无忌惮。一些娱乐场所违规经营,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不仅如此,学校附近也存在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恶性聚集空间,这种空间人员复杂,包含了真正意义上的“街角青年”^[21],不仅导致校园“新街角青年”形成不良惯习,而且都为普通在校学生提供了接触

到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机会,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后备军”。娱乐场所的监管不力以及学校周围“街角青年”的聚集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22]。因此,应加强社会监管力度,对娱乐场所进行严格的监控与管理,严禁未成年人进入,对学校周围的不良社会人员进行监管,减少其对在校学生的不良影响。

本文以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交互作用为主线,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以及出路进行了探讨,清晰地展现了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横向场域流动、文化资本失衡、对抗性惯习的生存状态逻辑,并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赋能文化资本以及破除不良惯习三个方面为促进校园“新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提出建议。本研究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对校园“新街角青年”进行分析,既解决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不连续性,避免了客观环境因素与主观个人因素的割裂,又为校园“新街角青年”提供了中观层面的分析;不仅为研究校园“新街角青年”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有效地将场域理论应用到了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分析及策略的思考上。

参考文献:

- [1] 符平.新街角青年的浮现——对湖南H镇一类青年的调查与分析[J].青年研究,2003(11).
- [2] 黄海.解析“街角灰色社会”——以湖南长沙某区“街角DY帮派”为分析对象[J].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6(1).
- [3] 郭娟.初中生街头少年的社会互动研究[J].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2014(1).
- [4] 符平,文建.新街角青年浮现——对湖南H镇一类特殊青年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4(3).
- [5]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6] Grillo C M .Revisiting Fromm and Bourdieu: Contributions to habitus and realism[J].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18(4).
- [7] Bourdieu P ,Wacquant L 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 [8] 刘生全.论教育场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
- [9] 苏春景,赵翠兰.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看“问题学生”的生成[J].中国特殊教育,2010(8).
- [10] 渠桂萍.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11]方俊奇.论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所形成弊端的破解之道及对其象征资本的再思考[J].法国研究,2019(1).

[12]Piroddi C.Hope,habitu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A Bourdieusian proposal[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21(4).

[13]睦依凡,俞婷婕,李鹏虎.关于大学文化学理性问题的再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5).

[14]顾明远.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

[15]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6]王刘飞,王毅杰.后排男孩: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群体塑造[J].青年研究,2016(1).

[17]Dajani K G.The Ego's Habi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Culture Plays in Structuring the Ego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2017(4).

[18]马维娜.局外生存——相遇在学校场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9]赵敏.学校管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0]冯承才.环境犯罪学视角下街角青年易罪错空间研究[J].青年研究,2019(3).

[21]冯承才.恶性聚集空间:街角青年罪错环境研究[J].人口与社会,2020(4).

[22]冯承才,费梅苹,金振浪,等.闲暇聚集点对在校来沪青少年社会融入的影响[J].当代青年研究,2008(8).

Corner Temptation: Survival Status of “New Corner Youth” on Camp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MENG Weijie¹, FAN Linlin²

1.School of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The “new street corner youth” on campus are a marginalized and disadvantaged group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from the ordinary students to the “street corner youth”, whose anti-social consciousness is relatively weak, but if their bad behavior is not corrected in time, it still has a greater social harm, which not only hinders their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reacts on the campus culture atmosphere. The youth with seriously bad behavior may go to the path of crime. At present, 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as the horizontal field flow under the street corner worship, the capital imbalance under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antagonistic habit under the school disciplines in the survival field of “new street corner youth” on campus.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coping strategies for their outlet from such aspects as fostering teacher-student rapport, empowering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getting rid of the deviant behaviors.

Key words: new street corner youth; field; habit; capital

(责任编辑 沐 瑾)